

移风易俗基层行

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

人和村和 和孝有爱 生前身后 老来无忧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王雪 杨静然 摄影 魏志广

初秋的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，暑热渐消，绿意仍浓。

9月9日一早，82岁的刘子江在村孝老食堂吃过早饭后，就溜达着回了家。他家门口挂着五六块牌子，“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小屋”“快乐老头工作室”“中国近代史料展陈馆（河北）暨人和镇村史馆资料收集整理办”……老人告诉记者，自己整理、宣传村史，是从村里建了孝老食堂后开始的。“像我这样的独居老人，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到孝老食堂吃，还不花钱。不干点活儿，都对不起天天给我们做饭的乡亲们。”

让老人们感动的，不光是孝老食堂，还有乡亲们以志愿者形式参与的白事简办活动。人生大事生死二字，孝老食堂让他们生而幸福，白事简办让他们身后无忧。

一个创举 改变千年风俗

人和镇村，是个有故事的地方。清末，李鸿章周盛传来此建马厂兵营，天津海口的买卖人聚来此聚居，后渐成村落，形成了以和为贵的村风。

百年时光流转，到了2016年1月1日。村里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，下决心根除白事大操大办的陋俗。

“那时候，一场白事办下来，普通人家要花三五万元，富裕人家更是达到六七万元。大伙儿都觉得应该改，可这是千年习俗，谁也不敢破例。”村党支部书记胡宗权说。

胡宗权当过兵，有股韧劲。他认准的事，千方百计也要干成。他带领村“两委”提前筹划每个细节，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，组建了十几个志愿服务小组，置办了从灵棚、凉棚、移动锅灶到白烛、白布、电子鞭炮等一应物品。村“两委”人手不够，他就从身边亲友开始，挨个动员大伙儿参加，很快组建起一支36人的移风易俗志愿者队伍。

村里一位老人病重。老人长子申忠华开超市，次子在京经商，家庭条件好，本想按风俗大办一场。胡宗权和村干部前后4次登门做工作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哥儿俩最终答应把白事交给村“两委”来办。

不久，老人深夜去世。得到消息后，胡宗权一声令下，36名志愿者带着一应物资，深夜就位，搭灵棚、扯孝、建临时厨房……子女至亲穿孝服，吊唁的戴白花。葬礼上取消宴席，只做一荤一素两个菜，帮厨的穿白大褂、戴卫生帽，干净卫生……连续3天，胡宗权和村干部从头到尾，一直到老人下葬。

丧礼办得既节俭文明又排场体面。让申家人想不到的是，办完白事，村“两委”让把能继续使用的物品交回理事会。穿过的孝衣、孝布都被洗得干干净净，留待别家再用。孝布破了也没关系，一件只赔几元钱。兄弟俩专程找到胡宗权致谢：“以后谁家再有白事，我家也上！”

移风易俗的当头炮就这样打响了。从那以后，一段顺口溜在村里流传开来：“丧事不喝酒，孝衣归公有，歌舞鞭炮全不要，遇事就带两只手。”

当时的青县文联主席韩雪知道后，很受感动，专门创作了音乐快板《移风易俗当标兵》。后来，村民们凭这个节目在青县文艺汇演上获了奖。如今，这个节目成了人和镇村的保留节目，经常在村里的运河大舞台上演出。

孝老食堂里的“暖心饭”

说起孝老食堂，不能不提人和



▲人和镇村的老人们幸福过晚年

▶在孝老食堂服务的都是村民志愿者们



扫码看视频

镇村。而这源自胡宗权一次意外的发现。

一天中午时分，胡宗权看见老人们围在一起唠嗑，就催大伙儿回家吃饭。没过多大工夫，他又碰见了这些老人。“大伙儿怎么还没去吃饭？”他问。

“吃过又回来了。”韩秀凤老人说。“走！到您家看看，到底吃的啥？”胡宗权说。

他这一看，还真发现了问题。“韩大娘家条件不错，吃的却是剩饭剩菜，原来是她一个人懒得做饭。”胡宗权又走访了几位独居老人，发现他们不仅吃饭凑合，事事都凑合，就算生病了，只要能扛着，就不肯告诉儿女，有时小病挨成大病，小事磨成了大事。

胡宗权是出了名的孝子，最看不得老人过不好。他马上召集村“两委”成员研究，决定创办孝老食堂，为十多户独居老人和五保户、脱贫户养老。

消息传出，热情的乡亲们跑来了。在原来移风易俗志愿者队伍的基础上，村干部和志愿者排班轮流做饭，为老人免费提供一日三餐。2020年12月10日，孝老食堂办起来了。不仅老人们欢迎，在外打拼的儿女们更是感动，争先恐后地捐款。菜农免费供菜，更多村民加入到志愿者队伍，风气越来越好，人心越来越齐。

很快，青县180个村陆续办起孝老食堂，万余名老人从中受益。后来，沧州在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推广孝老食堂的做法，受益老人更多了。

就在孝老食堂的模式被不断“复制”的时候，胡宗权又从老人洗衣难、洗澡难的现实问题出发，建起了孝老洗衣房、孝老助浴间。在上级部门的关怀下，孝老食堂也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，休息间、娱乐间、凉亭等设施越来越全。老

人们在村里被高看，回到家更受尊敬。和孝的村风引领带动和孝的家风、民风。

如今，这股和孝的村风也被搬上了舞台。以人和镇村孝老食堂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小品《姐弟争爹》，在村里的运河大舞台上演出。

建兰大娘的 生前身后事

8年移风易俗，人和镇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村，志愿者队伍达到100多人。不管谁家老人去世，人和镇几乎全村出动。在县城或外地工作、经商的村民，甚至出嫁的姑娘们也都赶回来。

今年7月天气最热的那几天，村里88岁的张建兰去世了。

张建兰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她身形瘦小、佝偻着背，不太爱说话。因为儿女在外打工，她的一日三餐也经常凑合。2020年12月孝老食堂成立后，没有特殊照顾，一日三餐，老人基本上都去孝老食堂吃。记者曾多次到人和镇村采访孝老食堂，对张建兰印象深刻。一次孝老食堂开饭前，老人们围坐一起，唱起了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张建兰边唱边拍掌，一扫平时沉默的样子。还有一次采访，在孝老食堂帮厨的姚秀香正在烹制红烧羊排，她说：“这是建兰大娘的外孙欧阳艳特意给老人们买的。”那天吃饭时，张建兰虽然还是话不多，却一直笑着。后来，村里又陆续有了孝老洗衣房、孝老助浴间。晚年生活，他们越过越舒坦。

张建兰和老人们都有个愿望：去北京看看天安门、看看升国旗。可他们又怕麻烦儿女，这个愿望一直埋在心底。一次，胡宗权问他们有什么心愿，他们随口一说，没想到胡宗权走了心，村“两委”真带

他们去了北京。从那以后，不爱说话的张建兰见了胡宗权总会说：“老七（胡宗权在家行七），村里越来越美了，孝老食堂有暖心饭，百年后还有你们给操持后事，让孩子们省钱。活在人和镇，这辈子值了。”

人和镇村共有117户。在张建兰的葬礼上，村里每家每户几乎都来了人。第一个白事简办的村民申忠华，也在其中。他说：“村里有事再忙也要来。别的不说，就冲村干部们为大伙儿操劳的这份心意，不来，都对不起他们！再说，谁家还没有个事儿呀。”

账房里设了两个账本，一是亲友们随礼的账本，一是记录移风易俗志愿者服务工时的账本。大家先登记好工时，穿上印有“人和镇志愿者”的白色、绿色T恤，再按分工各司其职。整个白事有条不紊地进行。

灵堂一左一右摆着人和镇村委会和移风易俗理事会敬献的两个花圈。起灵前，村“两委”还为老人开了追悼会。

葬礼上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：村委委员申忠和在大喇叭里公布了参加这次白事的志愿者名单。一天、两天的、三天的，清清楚楚。这对志愿者是个激励，对没有参加的人也是一种鞭策。申忠和说，这是村里多个志愿活动中中的一个，年终会根据这些来评定优秀志愿者。

账房最后算账，张建兰的葬礼花了11600元。这个数字和8年前相比，最少节省了二三元。老人的儿女特别感动，拿出4300元答谢忙乎人。忙乎人都是村里的志愿者，他们把钱全部捐给了孝老食堂。

“厚养薄葬、慎终追远，为老人办好白事，是村民们孝老的体现。把钱捐给孝老食堂，更有意义。”胡宗权说。

在国宝“莽权”的保护之路上，沧州人杨慕时功不可没

保护国宝“莽权”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“莽权”，顾名思义就是王莽新朝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，一共8件，1925年出土于甘肃，如今分别珍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在“莽权”的保护之路上，沧州人杨慕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8月30日，记者赶往北京，采访了杨慕时先生的孙子、孙女杨万里、杨万春、杨万胜、杨婕。他们说：“爷爷保护、捐献‘莽权’已经是90多年前的事了，但每次说到此事，我们仍然油然而生崇敬之情。”

78岁的杨万里儒雅严谨，一派学者之风。退休后，他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校长、北京市人大代表，曾担任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（不驻会）。他说，爷爷去世早，关于爷爷的故事，他们大多是从奶奶、父母和爷爷的朋友那里听说的。退休后，他开始查阅史料研究爷爷的生平。爷爷一生做过很多大事，他保护、捐献“莽权”的故事，背后蕴含着家国情怀、民族大义，尤其令人感动。

外国人盯上“莽权”

时光回溯到上世纪20年代。

1925年，一场大雨后，甘肃省定西县（今甘肃省定西市）峡口镇秤钩驿的农民秦恭偶然从地里发现了8件大小不一的铜器。1929年春，迫于生计，秦恭的哥哥秦让用手推车推着这些铜器到兰州去卖，以废铜烂铁的价格，卖给了古董商。这些铜器在古董商之间转卖，其中，2件刻有铭文的铜器在北京卖出了天价，一下子在兰州引起了轰动。

此时的杨慕时正担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。他保护“莽权”的行为，还要从甘肃计划开采玉门油田说起。

杨慕时是盐山县韩集镇大高村人，毕业于直隶高等商业学堂。他早年参加北方同盟会活动，民国初年受到冯玉祥的赏识，成为其重要幕僚。从1925年起，杨慕时先后任甘肃省政府委员、财政厅厅长、民政厅厅长、建设厅厅长等职。当时甘肃连年天灾，战火频频，他大力赈灾抗灾，厘定税制，严惩贪官污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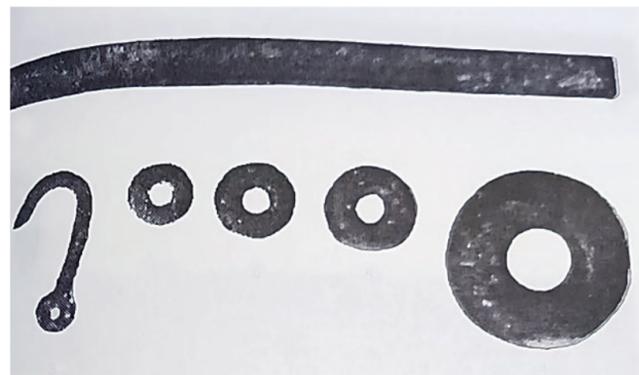
“1929年，甘肃勘探部门发现玉门一带石油蕴藏丰富，上报到建设厅。当时爷爷正担任建设厅厅长，准备开采玉门油田。外国人听说后，来到兰州找到爷爷，提出由他们出资主导油田开采，并许诺给爷爷股份。爷爷深知油田是国家资源，绝不能私自出卖，他断然拒绝了外国人的提议并说：‘只要我在位一天，绝不让你染指甘肃的事务。’”杨万里说。

这几个外国人见计划不成，又盯上了刚刚引起轰动的秤钩驿出土的铜器，想以高价买走。当时，兰州古董商手中还有6件铜器。虽然还没有最终确定文物的价值，来询价的人却络绎不绝，古董商准备待价而沽。

强买“莽权”保住文物

得知此事后，杨慕时坐不住了。

自从1925年到甘肃任职以来，了解到敦煌文物流失国外的情况，杨慕时十分痛惜。1900年，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敦煌石窟藏有大量古代文书和佛像。此后20多年间，不断有外国人利用欺骗、买通等手段，窃走古书、壁画、塑像、木质活字印刷字模等大量珍贵文物。杨慕时痛恨外国人私自收购文物的行径。对这几个外国人的行为，他一直非常警惕。那时，甘肃省政府虽然也发布了保护地方文物、防止流失的公告，但当时战乱不断，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，政府也没有收购文物的资金，这批文物很可能被外国人买走。怎么办？



“莽权”（部分）



杨慕时先生(1889-1945)

杨慕时果断出手，拿出家中积蓄800块银圆，派省会公安局局长高振邦来到古董商家中，摆下银圆，强行抬走了剩下的6件铜器。

“爷爷决定买下‘莽权’时，还不清楚这些文物的价值。他只是觉得，不能再让中国的文物流失国外。”杨万里说，爷爷为官清廉，去世时家中一贫如洗。最终由他的生前好友、著名爱国将领高树勋一力操持，才办了后事。奶奶生前说过，这800块银圆，在当时是一笔巨款，爷爷已倾尽了家财，比起那位古董商收购时的价格，已翻了8倍。当时的情形迫在眉睫，爷爷虽说是强买，但目的是保护文物。

杨慕时任建设厅厅长，为何能指挥公安局局长高振邦？杨万里说，1929年，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离开甘肃前曾下令，把省政府一切事宜交由杨慕时与另一人临时代理。而且，杨慕时与高振邦同为盐山人，杨慕时在军中久有声望，高振邦也很尊敬他。

杨慕时让高振邦将这些铜器买回后，直接拉到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。他请来当时这方面的文物专家，经鉴定、研究后最终确定，这批铜器就是王莽新朝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，是国宝级文物。

高风亮节捐献国家

1930年4月，杨慕时赴陕西省担任西安市市长。临行前，他将这批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。他说：“这批古董出自甘肃，自当留给甘肃民众。”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杨慕时参与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，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抗战期间，他曾任高树勋领导的39集团军总参谋。1945年春，杨慕时病逝于西安。

“爷爷临终前留下遗言说，‘莽权’是国家珍贵的文物，不能私人占有。他还说，‘莽权’出土于甘肃，应该留在甘肃，供甘肃民众参观和研究。”杨万里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都说，每次和家人讲起这段故事，总是又感慨又自豪。感慨的是，为了保护国家文物，爷爷不计个人得失，这样的人，古今又有多少；自豪的是，正是爷爷关键时刻勇于出手，才让国宝“莽权”避免了流失国外的结局。

杨慕时捐献国家的6件“莽权”中，历经战火、岁月，如今5件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，1件和当时北京古董商买走的2件“莽权”珍藏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。一套文物虽身处两地，但从未流失国外。

“度量衡是国家统一的象征。我们热切盼望望着分藏两处的‘莽权’早日合一，以实现爷爷的愿望。”杨万里说。